

政治型交易成本测算的两个维度及其关系 ——基于中国分省份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玉国¹, 王琳²

(1. 山东经济学院 统计科学研究所, 山东 济南 250014;

2. 山东经济学院 财政金融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学术界对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定量研究是从宏观、微观两个维度平行发展的, 目前尚未发现关于两者间数量关系的研究成果。为了弥补这一学术空白, 文章以我国各省份的截面数据为样本, 对政治型交易成本的两个测算维度及其数量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是两个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呈现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差异必然导致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差异。所以, 必须控制政府规模, 减少政府本身的运行成本, 以减少政府机构对企业的经济压力, 即通过节约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达到节约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的目的。

关键词:政治型交易成本; 测算维度; 数量关系;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 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0)01-0016-11

一、政治型交易成本测算及其两个维度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 又译作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和重要工具, “是任何可被接受的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际运行方式的解释的关键……如果不重视交易成本, 无论是经济行为还是制度安排都无法得到正确理解。”^①根据产生原因的不同, E. G. Furubotn 和 R. Richter(2001)将交易成本分为市场型交易成本、管理型交易成本和政治型交易成本。其中, 市场型交易成本是交易双方获取信息、搜寻、谈判、保障合约执行所涉及的费用; 管理型交易成本指公司或其他团体建立和为了维系组织的运行而必须支付的费用; 两者是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中发生的, 为提供这种背景的制度安排以及与之有关的公共品而产生的成本就是政治型交易成本(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作为交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型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有着重要影响, 尤其对体制转型国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09-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8BJY016);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Y2008H32)

作者简介:金玉国(1964—), 男, 山东青州人, 山东经济学院统计科学研究所教授;

王琳(1979—), 男, 山东菏泽人, 山东经济学院财政金融学院讲师。

交易成本的定量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专门针对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定量研究却非常少见。一般认为,有关政治型交易成本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J. R. Commons,他将“交易”的概念和主流经济学中“生产”的概念相对应,将“交易”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限额的交易(J. R. Commons, 1934)。其中,限额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是政治型交易成本的来源。学术界大多基于这个理解讨论既定制度架构下的政治型交易成本水平的测算问题。从为数不多的已有文献看,研究者一般从两个维度理解和测算政治型交易成本。

一部分学者从宏观维度入手讨论政治型交易成本及其测算问题。按照 E. G. Furubotn 和 R. Richter(2006)的观点,政治型交易成本是“集体行动提供公共品所产生的费用”,^②包括建立、维持、改变一个体制中的正式、非正式政治组织的费用和政体运行费用。所以,研究者认为,政治型交易成本的规模大致等价于公共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而产生的各项费用之和。例如,Wallis 和 North (1986)用政府的交易活动的支出价值对美国政治型交易成本规模进行测量;王磊(2004)照此测算了我国的公共部门的交易成本;金玉国(2008)用公共部门消耗或占用的社会资源的规模测算了我国政治型交易成本的规模,等等。由于宏观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与目前的宏观经济核算体系(SNA)相联系,数据易于取得,测算相对容易,所以文献较多。其缺点是测算比较粗略,尤其无法对非货币性的交易成本进行反映。

另外一部分研究者则从微观维度(即企业的角度)理解和测算政治型交易成本。他们认为,微观维度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第一,制度的使用成本,指企业使用政府供给的制度(规章、法律)安排时消耗的时间成本、货币成本;第二,制度的衍生成本,即一些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而建立的制度,由于不合理而衍生出的额外的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第三,非制度化成本,即企业由于政府官员的设租以及索取回扣等非制度化的交易行为所付出的代价。由于这些项目无法在现行宏观经济核算体系中完全体现出来,所以微观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只能借助于个案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加以测算。经典的案例如 Hernando de Soto(1989)对开办企业的交易成本即“进入成本”的测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微观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的测算问题。“进入成本”是指由于政府实施营业准入管制,企业的开办者被迫付出的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类似的有 Decio Zylbersztajn 等人(2003)对巴西开办一个服装企业所需要的成本估算,等等。这种个案观察的方法非常巧妙地回避了如何计量交易成本的绝对量这一棘手问题,在交易费用测算方面是一种创新,但也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不同观测指标量纲不同,不能直接汇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测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这两个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的研究迄今为止是平行发展的,尚未发现

有关二者间数量关系的研究成果。为了弥补这一学术空白,本文拟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 2007 年我国各省份的截面数据为样本,从两个维度测算各省份的政治型交易成本,然后测定二者的数量联系,并分析这一联系背后的经济原因。

二、宏观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测算

按照 E. G. Furubotn 和 R. Richter(2001)的观点,政治型交易成本包括建立、维持和改变一个体制中的正式、非正式政治组织的费用 and 政体运行费用。其中,建立、维持和改变一个体制中的正式政治组织的费用 and 政体运行费用大体上可以用公共部门消耗或占用的社会资源来表示。金玉国(2008)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非正式政治组织的费用相对于正式政治组织的费用是比较小的,而且二者之间很可能存在正的相关性。所以政治型交易成本的规模大体可以在公共部门消耗或占用的社会资源的规模方面体现出来,尤其在变动趋势方面更是如此。本文正是按照这一理解对宏观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进行测算。

为了获取数据的方便,按照金玉国(2008)的做法,本文将公共部门定义为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公共管理和社会团体”大类。公共部门消耗或占用的社会资源规模包括物力、人力和财力三个方面,所以本文设置了以下三个指标,作为政治型交易成本的代理变量:

1. 政府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政府消费支出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它占 GDP 的比重基本反映了公共部门消耗或支配的社会物力资源的程度。

2. 政府从业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重。基本反映了公共部门占用的社会人力资源的程度。

3. 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基本反映了公共部门占用的社会财力资源的程度。

为了综合反映政治型交易成本占社会资源的比重,本文将以上三个观测指标进行简单平均,得到宏观维度政治型交易成本的相对指标:

宏观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相对水平) = (政府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 + 政府从业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重 + 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 3

2007 年我国内地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统称为“省份”)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相对水平的计算见表 1。

根据表 1,从相对水平看,我国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占社会资源的比重全国平均为 14.6%,标准差为 2.58%,最低的上海,占社会资源的 8.95%,最高的是青海,占社会资源的 22.53%,可见省际差异比较大。

表 1 2007 年我国各省份政治型交易成本计算表

省份	物力资源			人力资源			财力资源			宏观 政治型 交易成 本(%)
	政府消 费(十 亿元)	GDP (十亿元)	比重 (%)	政府部 门职工 (万人)	职工 总数 (万人)	比重 (%)	行政管 理支出 (亿元)	财政支 出总额 (亿元)	比重 (%)	
北京	204.4	935.3	21.85	29.8	478.9	6.23	179.6	1 649.5	10.89	12.99
天津	75.5	505.0	14.95	12.1	176.0	6.86	72.3	674.3	10.72	10.85
河北	196.4	1 371.0	14.33	72.0	486.2	14.82	269.4	1 506.6	17.88	15.68
山西	71.7	573.3	12.51	45.2	366.7	12.32	210.1	1 049.9	20.01	14.95
内蒙古	93.8	609.1	15.39	31.3	243.5	12.83	194.0	1 082.3	17.93	15.38
辽宁	116.0	1 102.3	10.52	46.7	473.0	9.88	271.2	1 764.3	15.37	11.92
吉林	76.9	528.5	14.54	29.2	256.5	11.38	141.7	883.8	16.03	13.98
黑龙江	122.6	706.5	17.35	39.3	457.8	8.59	168.0	1 187.3	14.15	13.36
上海	156.1	1 218.9	12.81	16.7	293.1	5.69	182.6	2 181.7	8.37	8.95
江苏	348.9	2 574.1	13.55	56.2	667.3	8.42	438.3	2 553.7	17.16	13.05
浙江	234.3	1 878.0	12.47	48.8	632.7	7.71	328.9	1 806.8	18.20	12.80
安徽	75.5	736.4	10.25	41.6	323.5	12.85	195.9	1 243.8	15.75	12.95
福建	113.8	924.9	12.31	28.1	429.3	6.54	161.9	910.6	17.78	12.21
江西	74.6	550.0	13.57	37.5	275.0	13.62	146.7	905.1	16.21	14.47
山东	369.8	2 596.6	14.24	96.6	879.7	10.98	421.8	2 261.8	18.65	14.62
河南	201.1	1 501.2	13.40	95.5	699.0	13.66	355.7	1 870.6	19.02	15.36
湖北	129.0	923.1	13.97	51.5	443.8	11.60	221.3	1 277.3	17.32	14.30
湖南	137.2	920.0	14.92	64.1	410.0	15.64	256.6	1 357.0	18.91	16.49
广东	329.4	3 108.4	10.60	87.1	980.9	8.88	523.4	3 159.6	16.57	12.01
广西	91.8	595.6	15.41	35.3	271.8	12.98	193.4	985.9	19.61	16.00
海南	18.7	122.3	15.29	8.4	74.8	11.26	45.1	245.2	18.41	14.99
重庆	62.0	412.3	15.04	21.5	220.8	9.72	111.4	768.4	14.49	13.09
四川	138.6	1 050.5	13.20	63.6	520.4	12.23	321.4	1 759.1	18.27	14.56
贵州	52.6	274.2	19.17	33.4	207.5	16.10	149.0	795.4	18.73	18.00
云南	86.0	474.1	18.13	40.4	280.7	14.40	187.0	1 135.2	16.47	16.34
陕西	49.9	546.6	9.12	42.3	330.9	12.78	190.7	1 054.0	18.10	13.33
甘肃	49.9	270.2	18.47	33.9	190.5	17.78	111.1	675.3	16.45	17.57
青海	23.6	78.4	30.09	7.3	43.1	16.98	57.9	282.2	20.53	22.53
宁夏	17.5	88.9	19.67	7.3	56.3	12.91	38.4	241.9	15.87	16.15
新疆	91.7	352.3	26.04	30.8	239.4	12.87	148.4	795.2	18.66	19.19

注:1. 职工人数均为年底数;“政府部门职工”数用现行“按行业分职工人数”统计中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职工人数代表。2.“行政管理支出”用现行财政支出分类中的“一般公共支出”数据代表。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 年版。

三、微观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测算

微观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是从微观经济单位(以下统称为“企业”)的角度观察的交易成本,即企业为了使用政府提供的规制和服务等公共产

品必须付出的时间和货币成本。这一维度的交易成本只能采用个案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在我国现阶段,虽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要遵循国家统一颁布的法规政策,但是地方政府在制定地方政策和执行中央法律法规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意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政治型交易成本,从而使各地区微观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水平有所不同。

按照金玉国、张娟(2009)的理解,微观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主要体现为企业在开办企业、登记物权、获取信贷、执行合约等与政府打交道时所需付出的时间和货币成本等方面,所以,本文从上述四项涉及企业日常运行且与地方政策密切相关的项目出发,对微观维度政治型交易成本进行观测。其中,“开办企业”反映企业家开办一家工商企业在正常条件下所需要完成的所有程序,包括所有必要的执照和许可证,完成所有相关部门要求的通告、验证和审批。“登记物权”反映企业购买土地和建筑物时,财产所有权由卖方向买方转移必须的全部步骤、耗费的时间和货币成本。“获取信贷”项目衡量设立和登记担保物权的成本和时间,从而反映企业融资的便利度。“强制执行合同”衡量司法系统解决商业纠纷的效率。^③

由于上述项目在同一省份的不同城市也有差异(当然其差异肯定小于省份差异),为了获取数据的方便,本文用各省会(首府)城市的数据代替所在省份的数据。一个省份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大小可以在以上四个项目包含的步骤数、办理所需时间和支付的货币成本等方面反映出来,它们构成了政治型交易成本的观测指标。在具体构建观测指标体系时,本文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微调。例如,2007年我国各省会城市的开办企业步骤数都是12—14个,差别不大,因此该指标没有进入指标体系。而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货币成本的绝对数比较意义不大,故本文的成本指标一律使用相对数指标,其中,开办企业中的成本指完成注册程序所需费用占省城人均GDP的比重,最低注册资本金指最低注册资本金额占省城人均GDP的比重;登记物权中的成本指完成所有程序所需花费占财产价值的比重;获取信贷中的成本指获取贷款所需成本占贷款价值的比重;强制执行合同中的成本指法院诉讼程序的法定成本占标的物价值的比重。

由于政治型交易成本观测指标较多,各自量纲不同,为了得到反映各省份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水平的综合评价,本文采用多元统计方法中的因子分析法进行指标处理和合成。以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和(以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对各省份的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大小进行总体评价。由于因子分析的计算量比较大,本文采用了SPSS 16.0进行数据处理。限于篇幅,将数据的因子分析过程略去,观测指标体系及最终计算的各省份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即因子得分)如表2所示。

表 2 2007 年各省份政治型交易成本评价指标数据

省份	代表城市	开办企业			登记物权			获取信贷		强制执行合同		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	
		时间	成本	最低 资本金	步骤数	时间	成本	时间	成本	时间	成本	因子得分	排序
北京	北京	37	3.2	200	10	59	3.1	15	2.7	340	9.6	-0.490	9
天津	天津	41	3.7	200	5	42	4.4	14	2.7	300	11.3	-1.007	4
河北	石家庄	42	9.8	203	10	58	5.2	15	2.8	397	12.2	-0.148	11
山西	太原	55	9.3	244	10	62	5.4	16	2.9	300	26.4	0.399	21
内蒙古	呼和浩特	48	7.9	200	11	47	4.6	15	3.3	330	23.7	0.130	15
辽宁	沈阳	41	6	200	12	51	3.1	20	2.8	260	24.8	0.152	17
吉林	长春	37	9.5	225	8	55	4.2	22	3.3	540	18.4	-0.159	10
黑龙江	哈尔滨	42	11.9	208	8	55	6.1	13	3.1	290	31.5	0.022	12
上海	上海	35	3.1	200	4	29	3.1	8	2.9	292	9	-1.484	1
江苏	南京	31	5.8	200	7	31	4.6	10	2.1	112	13.6	-1.088	2
浙江	杭州	30	5.7	200	8	50	3.7	11	3	285	11.2	-0.854	5
安徽	合肥	42	19.4	349	10	46	5.6	20	2.8	300	41.8	0.790	27
福建	福州	40	6.7	200	7	37	4.1	7	2.3	342	13.7	-0.853	6
江西	南昌	40	14.6	318	10	50	6.1	17	5.9	365	16.5	0.133	16
山东	济南	33	6	200	8	39	4.1	10	2.9	210	22	-0.693	7
河南	郑州	41	11.6	267	11	60	5.1	16	3.3	285	31.5	0.4243	23
湖北	武汉	36	13.6	301	9	60	6.2	13	3.3	277	33.1	0.217	19
湖南	长沙	42	14.6	289	10	53	6.9	20	3.7	382	26.6	0.417	22
广东	广州	28	6.3	200	8	35	3.7	11	2.4	120	9.7	-1.069	3
广西	南宁	46	16.5	342	12	66	6.8	47	3.9	397	17.1	1.145	29
海南	海口	38	12.1	273	10	76	4.8	14	5.1	310	14.5	0.045	13
重庆	重庆	39	9.5	273	7	28	7	15	5	286	14.8	-0.590	8
四川	成都	35	19.1	354	11	39	3.9	12	3.2	295	35.5	0.431	24
贵州	贵阳	50	26.6	605	9	77	13	17	6.9	397	23	1.208	30
云南	昆明	42	13.9	383	9	66	5.4	18	4	365	36.4	0.618	25
陕西	西安	43	15.2	305	8	50	5.1	21	4	235	21.7	0.084	14
甘肃	兰州	47	14.1	409	10	78	7.8	20	8	440	29.9	0.912	28
青海	西宁	51	12	299	8	69	5.3	20	3.8	458	24.8	0.392	20
宁夏	银川	55	12	336	10	59	4.4	25	3.6	270	28.7	0.708	26
新疆	乌鲁木齐	44	9	230	11	45	4.2	24	3.4	392	20.5	0.208	18
平均数		41	11	273.8	9.4	52.4	5.2	17	3.6	319.1	21.8	0.00	—
标准差		6.6	5.3	88.3	1.9	13.6	1.9	7	1.3	87.8	8.9	0.701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集团:《2008 中国营商环境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根据因子分析原理,因子得分为负数,说明该省份的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低于全国平均数,如北京市的得分为-0.4904,表明北京市的政治型交易成本低于全国平均数-0.4904 个标准差;得分为正数,说明政治型交易成本高于全国平均数,如新疆的得分为 0.2075,表明新疆的政治型交易成本高于全国平均数 0.2075 个标准差;得分数值越小,表明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越小,排名越靠前。可以发现,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最低的是上海,最高的是贵州,30 个省份中有 11 个省份低于平均数,19 个省份高于平均数。

四、两个维度政治型交易成本的数量关系

为了观察两个维度政治型交易成本的数量关系,本文绘制了二者的散点图(图 1)。根据图 1,宏观交易成本较低的省份(如上海、江苏、广东、福建、浙江

等),其微观交易成本亦比较低,位于图形左下方;而宏观交易成本较高的省份(如广西、甘肃、贵州、青海等),其微观交易成本亦比较高,位于图形右上方,几乎没有例外。这就直观地说明了两个维度政治型交易成本的数量依存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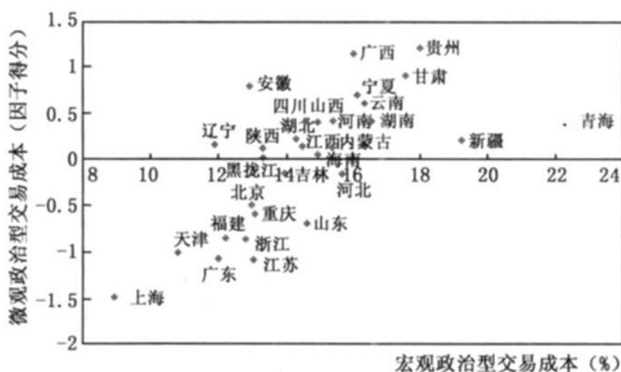


图1 两个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散点图

为了进一步分析两个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的数量依存关系,本文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二者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数值相关系数)为 0.627, Spearman 相关系数(等级相关系数)为 0.698,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将宏观交易成本记为 Macost,作为解释变量;微观交易成本记为 Micost,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text{Micost}_i = -2.6142 + 0.1792\text{Macost}_i + e_i$$

$$t = (-3.462^{**})(3.405^{**}) \quad R^2 = 0.4512$$

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计算 t 统计量(括号里的数值)时使用了 White 异方差校正后的标准差, t 检验表明两个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其中斜率系数为 0.1792,表明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占社会资源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因子得分)增加 0.1792 个标准差。 R^2 为 0.4512,说明不同省份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差异中,有 45.12%可以由各省份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差异所解释。

由于在计算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时应用了因子分析方法进行汇总,所以实际意义不太直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还分析了宏观交易成本与微观交易成本各观测指标的关系(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3)。

可见,两个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尽管观察角度不同,测算方法不同,但两个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存在密切数量依存关系,说明两种评价方法所得结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下面对其原因进行简要分析。根据“帕金森定律”,行政机构有一种自我膨胀的内在动力,以显示所属部门的重要性,凸显自身的权威,分解责任,从而使得行政机构的规模和行政人员人数呈增长趋势。M. Olson(1965)的研究表

明,政治型交易成本总量是一个集团内成员数量的增函数,随着集团内人员的增加,人均成本不变或不会减少很多。因此,政府规模越大,越不可能提供最优的公共物品的供应,表现为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占社会资源的比重上升。在我国不同地区,由于经济条件、历史文化不同,对政府规模控制的力度不同,造成了不同地区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差异(金玉国,2008)。

表3 宏观交易成本与微观交易成本各观测指标的关系

案例	观测指标	与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的相关分析		以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				
		Pearson 数值相 关系数	Spearman 等级相 关系数	R ²	斜率系数	标准化的 斜率系 数	t 统计量	显著性 水平
开办 企业	时间	0.541	0.599	0.293	1.592	0.545	3.463	0.002
	成本	0.531	0.575	0.282	1.239	0.531	3.316	0.003
	最低资本金	0.575	0.650	0.331	22.558	0.575	0.716	0.001
登记 物权	步骤数	0.425	0.505	0.181	0.350	0.425	2.486	0.019
	时间	0.596	0.600	0.355	3.604	0.596	3.921	0.001
	成本	0.492	0.563	0.242	0.409	0.492	2.989	0.006
获取 信贷	时间	0.379	0.494	0.144	1.208	0.379	2.166	0.039
	成本	0.448	0.645	0.201	0.262	0.448	2.653	0.013
执行 合同	时间	0.461	0.471	0.213	17.991	0.461	2.749	0.010
	成本	0.437	0.535	0.191	1.725	0.437	2.569	0.016

宏观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和微观维度的政治型交易成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行政机构规模膨胀,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相对水平的上升,必然加重企业的负担,导致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的上升。原因在于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行政权力寻求本部门或是官员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权力寻租)不可避免。由于行政部门同样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个具有各自经济利益的经济实体,行政机构的人也是“经济人”,如果制约缺失,他们会用手中的公权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服务。例如政府部门通过设置一些没有必要的审批项目和收费项目、设置烦琐的审批程序,一是为了扩大或维持控制的资源(行政权力),二是为“权力寻租”创造机会。学者吴思(2009)称这种权力寻租为“合法伤害权”。权力一旦不受控制,不受监督,掌权者人性恶的一面便会不断放大,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害他人,为自己牟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进入市场、为本企业获取项目、特许权或其他稀缺的经济资源等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货币成本,甚至是贿赂官员的成本。权力寻租就造成了社会非生产性成本增加,体现在微观维度上是交易成本的上升。

总之,行政机构规模的膨胀必然导致企业负担加重,体现为微观交易成本的上升,二者具有密切的因果关系。所以,不同地区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差异所解释,这就是二者数量

联系的内在原因。

五、研究的政策含义

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出现是市场交易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是广义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存在规模效应，政府是作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出现的，政治型交易成本可以看作作为节约市场型交易成本所付出的代价。按照“成本—收益”分析原理，政府介入经济活动是否合理（有效率）取决于由此产生的政治型交易成本（成本）与由于这种制度安排而节约的市场型交易成本（收益）的对比。在所节约的市场交易成本既定的假定下，政治型交易成本水平的高低起着或刺激、鼓励交易，或阻碍、限制交易的作用，对相关经济变量有着重要影响。一个国家存在着过高的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表明政治制度框架的设计或实施、运行有问题。高的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肯定带来高的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这是一种有害的现象，是应该尽力避免的。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有非常重要的政策意义。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古代大多数朝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官僚体系开始膨胀，十羊九牧，政府效率低下，造成生产者（农民、手工业者）的社会负担加重，市场经营活动的收益被政府过度剥夺，流民增加，就业与治安问题凸显；政府为稳定统治扩编军队，社会负担愈加增大，如此饮鸩止渴，恶性循环，导致社会动荡，朝代更迭。相似的轮回周而复始，可谓教训深刻。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模式和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拥有几乎无所不包的权力，形成了规模庞大、维度繁复的政府体系。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权力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而且凡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都顺理成章地转变成为政府该做的事，因此也都变成了政府权力的合理延伸，所以政府的权力还在不断地扩张。行政权力不但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而且也缺乏预算约束：没钱办事了，自己就可以收费解决问题（而且相当一部分能赚钱的企业本身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由于政府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大量高层次人才涌入政府机构（看公务员考试的踊跃景象）。政府规模膨胀，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的介入势必更加深入，造成审批、管制、收费无处不在，迫使企业付出高昂的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

所以，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首先，必须有效控制政府规模。通过控制政府规模，既可以减少政府本身的运行成本，节约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又可以减少政府机构对企业的压力，最终达到节约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的目的。节约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可以使社会资源愿意流入企业，而不是一窝蜂挤入政府机关。因此，必须从制度设计入手，对我国政治体制进行有效地调整，选择交易成本较低的政治架构，有效降低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当务之急是转变

政府职能,限制行政权力,一方面取消一部分审批、管制、收费的权力,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应该彻底退出。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维度,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①当然,从组织行为理论看,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会乐意自己削弱自己的权力,行政权力的限制,只能在体制、机构和预算等方面的制度制约中实现。其次,将政府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加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相应地修改国家赔偿法的有关条款,对于因政府滥用权力而蒙受损害的公民和企业,国家应当给予相应的赔偿或补偿。最后,要以宪政改革抑制政府官员机会主义,控制寻租行为,以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减少制度的人格化成本。通过宏观制度层面的改革使企业负担的政治型交易成本降到合理水平,真正实现以政治型交易成本节约市场型交易成本的目标。当然,从长远看,必须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适时推进,构建一个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文明、高效的现代行政体制和司法体制架构,从根本上降低政治型交易成本。

注释:

- ①②弗鲁博顿、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姜建超,罗长远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页、第64页。
- ③对各项目和观测指标的详细设定参阅世界银行集团:《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或网址 <http://www.doingbusiness.org>,2008-09-10。
- ④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参见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6429094.html>,2007-10-24。

参考文献:

- [1]金玉国. 中国政治型交易费用的规模测算与成因分解:一个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2008,(12):46—52.
- [2]金玉国. 宏观层次政治型交易费用及其效应: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A]. 董长瑞. 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2008(第一辑)[C].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174—187.
- [3]金玉国,张娟. 基于因子分析的非市场交易费用测度比较:以省会城市为例[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475—480.
- [4]王磊,张军. 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J]. 吉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5—9.
- [5]吴思.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修订版)[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 [6]Decio Zylbersztajn, Carolina Graca. Costs of business formalization: Measuring transaction costs in Brazil[J]. Revista de Economia Institucional,2003,(9):146—165.
- [7]Eirik G Furubotn, Rudolf Richter.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M]. New York: Wu-Nan Book Company Ltd,2001.

- [8]Hernando De Soto. The other path-the economic answer to terrorism[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d,1989.
- [9]J R Commons. Institutional economics[M].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1934.
- [10]Mancur Olson.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M]. Cambridge: Harvard College Press, 1965.
- [11]John Wallis , Douglass C North.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1870—1970[A]. Stanley L Engerman, Robert E Gallm . In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C].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95—161.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Measurement of 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ir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Provincial Cross-sectional Data in China

JIN Yu-guo¹, WANG Lin²

(1.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Shandong Economic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 Shandong Economic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is undertaken from the parallel angles of macro-dimension and micro-dimension in academia.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dimensions has not been found yet. For the purpose of filling in this academic blank, the paper takes the sample of the provincial cross-sectional data and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two measuring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ir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in the two dimension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The differences of macro 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have inevitably led to the ones of the micro 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Therefore, in order to loosen the economic pressure of governments on enterprises, the size of governments must be controlled, and the operating costs of governments must be reduced, that is to say, we could rely on the reduction of macro 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to save micro 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Key words: 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measuring dimension;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empirical study

(责任编辑 金 澜)